

太原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市民生活水平研究^{*}

李欢

内容提要:我国多数传统城市在近代较少受到西方冲击,更多保留了其自然发展的特点。本文以太原为我国传统城市的典型代表,考察其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化、市场化、商业化以及城市建设发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以在职人员为代表的太原市民的生活消费结构和贫富差距。民国太原近代化变迁卓有成效,并且对市民生活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由于发展工业的需要有所限制,并因资本的集聚使贫富差距扩大。

关键词:民国 太原 近代化 市民生活水平

一、引言

城市作为“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①为近代化提供了氛围和条件,是近代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的开端地,因而城市近代化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对近代化有不同看法:由“冲击—反应”模式、“资本主义萌芽论”,到“近代化即工业化”,^②再到经济现代化即市场化论断,^③进而发展到内涵较为宽泛的城市近代化特征问题(包括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④近代传统城市是与开埠城市相对应的城市类型,^⑤由于身居内陆接触世界市场较少,外向发展条件缺失,不能像沿海沿江开埠城市一样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推动走上近代化道路,只能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缓慢过渡,靠自己的努力推动城市走上近代化,这条道路更符合中国社会,更具有普遍性。^⑥隗瀛涛在对近代不同城市分类后,将北京、开封、成都、西安作为传统行政中心城市的典型代表,认为传统城市由于地理位置所限,不能像口岸城市一样在外国的影响下迅速发展,“它们只是在自己的轨道上,朝着近代化缓慢转型”,^⑦是近代化前城市旧类型的延续。由于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近代化过程中传统城市更多地保留了我国城市的特点,更加接近传统向近代自然过渡的路径。

民国时期太原市作为山西省会,主导着山西经济,在晋系军阀控制下对外部的冲击具有自主的应对和保护功能,使太原能够主动进行近代化变革,而较少像其他传统城市一样疲于战争(如中原地区城市)或被外国控制(如东北地区城市)。太原因而维持了长时间的安定局面,城市经济发展保持

[作者简介] 李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88,邮箱:lh_cass@126.com。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传统经济再研究——以制度转型为视角”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美]帕克、麦肯齐著,宋俊岭、吴建华译:《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② [日]滨下武志著,高淑娟、孙彬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吴承明:《传统经济 市场经济 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④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页。

⑤ 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 朱庆葆:《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清末民初安庆城市近代化研究》“序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⑦ 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第55页。

了相对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传统城市向近代化稳步过渡的典型代表。许一友用历史学的方法对清末到民国太原近代经济进行了较为宽泛的阐述。^① 刘建生、李茂盛、李玉文等从不同角度对山西近代经济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但均未从城市近代化视角对太原进行研究。^②

太原城市近代化肇始于清末洋务运动,与其他传统城市一样发展缓慢。民国初到1930年是太原商业普遍发展和壮大的阶段,^③特别是1917年阎锡山兼任省长以后到20世纪20年代,山西军政皆归其统筹管理,太原进入平稳发展时期,近代工业化方面先后改组或创办军人工艺实习厂、协同机器厂、育才炼钢厂、育才机器厂、山西火药厂等,以平均每年两座现代工厂的速度发展起来。近代市场化方面,开化市场、太原长途公路、斌记商行等相继出现,为传统城市的贸易注入了新活力。城市建设速度较快,当时来晋考察之人评价其“较之往昔已大异矣。”^④直到1929年中原大战前夕为筹集军费滥发货币,导致晋钞贬值、经济受损严重。1931年以后山西重新整合经济,成立西北实业公司,太原近代化到达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鉴于近代化作为前现代化或早期现代化,^⑤是一个延续的过程,难以完整的究其影响,我们选取民国初期到抗日战争以前这一较为连续稳定的迅速发展阶段进行研究,并探究这一时期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太原市民生活水平的变化。

二、民国时期太原城市近代化

民国是太原近代化转型时期,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城市组织、形态和功能都发生了转变。伴随工业建设的需要,兴建了许多厂区,扩大了城市规模,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变革,城市建设也随之发展,呈现出新的景象。

(一)近代城市化

民国太原市设在当时的阳曲县县城,以今太原大南门、大北门、小东门和水西门为界的城墙所辖之地,习惯上称阳曲县县城为太原或太原府(与当时太原县相区别)。民国九年(1920)设太原市政公所,民国十六年正式建市,省会警察厅改为太原市公安局,其管辖区域“东起城东门之外西人义地,西迄汾河边,南界大营盘,北至飞机场。东西宽二十余里,南北长三十余里”,^⑥城市范围打破原有城墙区域,扩展到周边更广大的区域,表现出规模扩大的趋势。

与此同时,太原人口开始大规模增长(见表1),太原城市人口从1918年的50 686人增长到1935年的207 667人。“大凡工商巨埠,便于企业寻工,故男性人口之集中极速。”^⑦太原人口增加即多为男性,1919年到1923年男女基本保持约2:1的比例增长,1924年开始男女比例几近3:1,可见随着当时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是促进城市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民国以来山西省内经济凋敝导致农村经济破产,而太原各项建设正方兴未艾,故“谋职业者,咸往来于省会”,“省内人口咸向省会流动,故年有增加”,^⑧仅1926年一年净迁入省会者就有3 906人,^⑨几乎占当年省会净增长人口的96%。农业人口向城市聚集,客观上促进了太原的城市化进程。

① 许一友:《太原经济百年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刘建生等著:《山西近代经济史(1840—1949)》,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李茂盛主编:《民国山西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李玉文编著:《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1840—1948)》,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③ 任步奎:《太原商业》,贾立进主编:《民国太原》,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④ 陈希周著:《山西调查记》(上),南京:共和书局1923年版,第7页。

⑤ 吴承明:《传统经济 市场经济 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⑥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山西省),1937年印刷,二(丙)。

⑦ 童家埏:《无锡工人家庭之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厦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51—690页。

⑧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五(丙)。

⑨ 山西省政府统计处编纂:《山西省第九次人口统计(民国十五年分)》,民国二十年刊行,第183页。

表 1 1918—1935 年太原城市人口统计 单位:户、人

省会	户数	男	女	合计
1918	—	34 933	15 753	50 686
1919	10 385	30 756	14 983	45 739
1920	11 492	34 379	16 497	50 876
1921	11 953	34 054	17 309	51 363
1922	12 882	38 979	18 878	57 857
1923	13 352	40 395	19 394	59 789
1924	13 688	62 790	21 178	83 968
1925	13 888	66 974	20 996	87 970
1926	15 073	69 598	22 453	92 051
1927	—	49 050	20 984	70 034
1928	—	74 830	26 463	101 293
1929	—	79 161	25 831	104 992
1930	—	83 890	27 776	111 666
1931	—	83 574	27 138	110 712
1932	—	113 145	33 082	146 227
1933	22 273	95 342	34 969	130 311
1934	24 454	100 560	38 898	139 458
1935	—	136 888	70 779	207 667

资料来源:山縣千樹:『山西省歷年先別戶口統計』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民國三十三年刊。

说明:此数据与《山西省第九次人口统计(民国十五年分)》以及李玉文编著《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1840—1948)》中相同年份数据均一致。

在大量人口聚集的基础上,太原人口职业类别也从侧面体现出近代化趋势。以 1926 年为例(见表 2),太原市人口共 92 051 人。其中,在职人员(士农工商)36 392 人,约占总人口的 40%。工业人口 10 362 人,约占在职人口的 28%;商业人口 15 485 人,约占在职人口的 43%;工商业人口合计 25 847 人,占在职人员的比例超过 70%。相较而言,农业人口仅有 1 114 人,占在职人口的比例约为 3%。可见,当时太原的产业结构已经开始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另外,作为山西省会,太原以党政军警为主的士的人数也较多,为 9 458 人,约占在职人口的 26%。

表 2 1926 年太原人口职业类别 单位:人

职业类别	职业	男	女	合计
士 9 458	议员	103	—	103
	官吏	1 580	—	1 580
	公务员	1 072	—	1 072
	军人	5 314	—	5 314
	警士	709	—	709
	教员	399	41	440
	律师	46	—	46
	医士	104	53	157
	新闻记者	37	—	37
农 1 114	农业	1 003	51	1 054
	畜牧业	33	—	33
	渔业	27	—	27

续表

职业类别	职业	男	女	合计
工 10 362	矿业	125	—	125
	工业	6 060	436	6 496
	劳力	3 286	455	3 741
商 15 458	商业	14 984	—	14 984
	娼妓	—	474	474
其他 55 659	学生	2 809	1 321	4 130
	其他	300	61	361
	无职业	31 607	19 561	51 168
合计		69 598	22 453	92 051

资料来源：山西省政府统计处编纂：《山西省第九次人口统计（民国十五年分）》，民国 20 年印刷。

说明：职业类别由笔者归纳，各类别人口数由所含职业人口数加总计算而得。

从表 2 中，我们还观察到女性在职人员只有 1 510 人，仅占全部女性人口的 6.7% 左右，且其中约有 31% 为登记纳捐的娼妓，从事正当职业的女性仅有 1 036 人。其余的无业人口可以作为家眷看待，与有工作的男性户主作为一家人，应该享有同等的生活水平。因此，在职人员的生活水平可以代表其家庭的生活水平，进而代表太原市民的生活水平。

（二）近代工业发展

太原的近代工业肇始于清朝末年，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受洋务运动之惠甚小，从 1892 年第一家近代工业——太原火柴局诞生，到 1911 年清朝灭亡的近 20 年间，只有 5 家近代工厂诞生。而处于同一时期的上海早已拥有船舶、机器制造、缫丝、棉纺、造纸、机器印刷等多项工业。

进入民国后，山西着力发展进口替代型工业，“对于一切合于内地需要之日用品，尽力仿造。设使仿造不得，则不惜重金资聘请外国技师加以指导”，^①太原工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到抗日战争前，太原已经拥有机械工厂 30 多家，遍布省城内外。尽管机械工厂数量仍逊于传统的手工业，但资本额、工人数量和总产出已远超出工作坊。太原机械工业共 37 家，仅占全部工厂数量的 10.1%，资本额已达到 12 759 800 元，职工数 8 170 人，年产值达到 10 735 775 元；作坊工业 329 家，占 88.9%，资本额仅为 522 914 元，职工数 4 134 人，年产值 1 522 456 元。^②

工业结构上偏向军火工业的上游产业——重工业，其中化学工业 7 家，铁工制造及修理 14 家，建筑业 2 家，动力工业 2 家，共 25 家，资本额 9 734 420 元，约占 75%；轻工业仅印刷、饮食、纺织工业共 12 家，资本额 3 225 380 元，约占 25%。兴建了万顺铁工厂、振元铁工厂、华盛铁工厂、太原陆军修械所、协同机器铁工厂、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山西火药厂、聚华五金机器厂、西北煤矿第一厂、晋绥兵工矿产测探局等。另外，机械工业多为公营事业，公营工厂 22 家，资本额约占 79%，职工约占 82.8%，年产值约占 69%。^③

机械工业的发展和外货涌入对传统手工业造成较大冲击和挤出效应，但在多数日常生活用品领域，仍以手工业为主。以纺织业为例，既有机械生产的晋升织染厂，也有永盛聚、东盛昌等工作坊。磨面业也是如此，“虽有规模宏大的面粉厂，但境内磨坊尚有七十四家之多”。^④这种现象广泛存在

① 《山西工业概况及经营方法》，原载于《新建设》第 4 卷第 30 期（1937 年 5 月 16 日），转引自贾立进主编《民国太原》，第 180 页。

②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一五（丙）。

③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一五（丙）。

④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二六（丙）。

于各行业,尤其是轻工业之中,盖当时机械工业偏重重工业领域,对轻工业替代性较弱。而同时期开埠城市的轻工业占主要地位,棉纺、面粉、卷烟为当时最大的三个行业,1936年长江6个口岸城市就有共44家棉纺厂,在关内地区占将近一半。^①

(三)近代市场扩大与革新

民国太原人口的快速增加使需求扩大,促使了商业发展和壮大。据调查阳曲县共有市镇约10个,商店数约226个,^②商业区,逐渐由大南关、南市街一线向东扩张,“钟楼街、柳巷、桥头街一带的成衣店、照相馆、鞋帽庄相继开设,房价日益昂贵,几有寸土寸金之势,首义街、正太街以及车站附近的旅客栈、饭店、货栈也逐步发达起来。”^③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也进行了革新,市场形式发生变化,开化市场、大中市场、百货商场、共和市场、中和市场、阜安市场等综合市场出现,这些市场规模大、商户多、经营商品种类齐全且各有特色,是当时太原的商业中心。另外提高服务质量,如1934年成立的土货商场聘任日本留学生彭毅丞为经理,大量收购地方公私企业产品,进行统一销售,并向一些工厂预供原料、收购制成品。在经营作风管理方面常召开职工大会,要求职工对顾客讲礼貌,“说顾客买下东西,店员要抱上送出门外,临别还说再见等”,^④对整个太原商业营业作风的好转都起到了带动作用。

除了狭义的商业外,还出现了近代新兴的服务业,如洋行及贸易公司、电影业、保险业、堆栈业、银行业等。当时较有影响力的贸易公司有祥记公司、斌记商行以及美国公懋、德国雅利、英国怡和等洋行,经营省内外及对外贸易。电影播放有新南门内青年会礼堂、平安电影院、光明电影院等,另山西大戏院和中华大戏院也兼放电影。保险业在太原是民国才出现的行业,当时有太平保险公司和中国保险公司,经营火险、寿险和行动险三种。^⑤堆栈业则是随铁路应运而生的,向铁路租定堆栈堆存货物的公司,主要有元盛、庆泰裕、兴顺利三家,按照货物类型和存放时间收费,并兼营转运和留宿货客的业务。近代金融方面以山西省银行为代表,承揽存款、贷款、汇兑、公积金及货币发行等业务,性质原为官督商办后收归官办,打破了原平遥、祁县等晋商把持山西金融的局面,增强了太原金融影响力。特别是晋钞的发行,成为20世纪20年代国内“信用颇佳”的货币,^⑥吸收了大量外部资本,实现了资本的集聚。

(四)城市建设发展

民国太原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市内各处有许多结构美轮美奂的洋馆建筑,是中国内地所少见的”。^⑦城内市街道路井然,为保持城市形象,还专门颁布了《太原市整理市容办法》,详细规定了清理墙壁、清理街道和沟渠、整饬商贩等内容。^⑧当时江苏人来晋考察,称其为“往来街衢尘埃不兴,较之往昔已大异矣。”^⑨尽管如此,由于近代化初期资本积累阶段,发展偏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因此在城市建设方面也主要着力于对经济发展作用较大的长途公路、铁路建设,对市内交通和其他公共服务则改善较少。

作为资源型重工业城市,交通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太原长途运输的铁路和公路都

① 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史林》2000年第4期。

②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九五(乙)。

③ 任步奎:《太原商业》,贾立进主编:《民国太原》,第134页。

④ 续承明:《太原土货商场纪略》,赵政民总编:《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山西省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年印刷,第1119—1120页。

⑤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三六(丙)。

⑥ 贾鸿鸣主编:《太原经济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⑦ 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17卷(山西省),1920年版,第29页。

⑧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北平民社1935年版,第70页。

⑨ 陈希周著:《山西调查记》(上),第8页。

较为完善,客运和货运能基本满足,“东有正太铁路以连屏汉,中有同蒲铁路纵观全省,北接平绥,南接陇海,白晋汽车路,经长治晋城以通河南博爱县,与道清铁路链接;南北及东西汽车路线均总汇于太原,为全省交通之中枢,故在经济上亦占重要地位。”^①于此同时,市内交通却未有长足进步,仍以人力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约有人力车2 000余辆,分为客运的洋车和货运的推车,多集中在火车站及长途汽车站外等待载客分货。“汽车之在太原市内者,属军政界长官及富商等自用。营业汽车尚无所闻。”^②

除交通外,其他公共事业多因与经济关系较疏而被忽视。如医疗卫生事业,医院多为民营,费用较贵。公营医疗只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成立临时机构,采取控制措施。福利保障也有所侧重,为培养建设人才,大力投资于教育事业,而对养老、残疾、外来避难者等关注甚少,贫民、乞丐触目皆是。再如城市基础设施,也偏重厂矿需要,为其提供水电,而使用电灯照明的居民则不足1/6,自来水普及率仅16%,排水管道总长也只有5公里左右,绝大多数居民仍使用井水。^③直至1936年制定的“山西省十年建设计划案”中才有创建自来水的内容,计划从城东北角外凿井取水,居高临下,建水塔,铺管道,发展自来水用户。但由于抗日战争打断了建设进程,加上技术条件限制,计划未能实现。太原解放时,城区面积30平方公里,人口21万,市内公路仍有一半以上为碎石路,市政公用设施依旧较差。^④

三、民国太原市民生活

太原作为省会城市,其职业结构中农民占比较少,不能像传统农村经济一样自给自足,衣食用度均需购买,形成消费需求。马斯洛根据需求满足程度将需求层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根据个人能力依次得到满足。^⑤进而可以将用于满足需求的消费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依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级增加。其中,生存型消费即为了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消费,包括衣、食、住等方面的消费,燃料费为生活取暖所需,也归纳于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即为了满足人们寻求更好发展需要的消费,一般包括卫生费、教育费、器具费(器具费不是生理需求,而更接近于生产所需的费用)和临时费(一般为婚丧嫁娶、买房置地、添置大件、发生意外等情况下的消费);享受型消费即满足人们享乐需要的消费,包括嗜好、娱乐消费。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的人其生存型消费所占比例越低,而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所占比例越高。由于民国年间太原人民消费结构变化不大,仅以1927年生活费为例,如表3所示。^⑥

(一) 生存型消费

生存型消费是最基本的消费类型,图1可见只有收入水平最高的士上,生存性消费占35%左右,符合其高收入下的消费结构;士中和商上生存性消费接近50%;其他阶层的消费结构均以生存型消费为大宗,占到50%—70%之间,是其全部消费的大半以上,可见其仍在为生计而活。生存型消费中各阶层以食料费或服装费占最大比例,食料费占比在10%—40%左右不等,服装费占比也多在10%—25%之间。

①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九四(乙)。

②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121页。

③ 赵永革、王亚男:《百年城市变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④ 赵永革、王亚男:《百年城市变迁》,第316页。

⑤ A.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50, No. 1, 1943, pp. 370-396.

⑥ “生活费原系分区调查(各县行政区自三至六不等),本书系将各区所报数目平均计算求得一县之数,依次编列”,本文已通过均值计算对个别数据进行了修正。晋绥总司令部统计处编纂:《山西省第六次经济统计正集(民国十三年分)》“第六次经济统计正集凡例”,民国十七年刊行。

表 3

1927年太原市人民生活费

单位:元

项目	士				农				工				商				
	上	中	下	均	上	中	下	均	上	中	下	均	上	中	下	均	
生存型 消费	服装费	155.50	73.75	42.25	90.50	37.75	24.00	16.50	26.08	51.00	37.75	21.50	36.75	75.50	53.25	29.50	52.75
	食料费	112.00	77.00	52.00	80.33	49.50	40.50	32.25	40.75	57.00	42.25	31.00	43.42	70.00	42.25	33.25	48.50
	居住费	37.50	22.75	13.25	24.50	18.00	11.75	7.75	12.50	19.75	13.50	8.75	14.00	28.75	17.00	11.50	19.08
	燃料费	27.75	19.25	12.25	19.75	16.50	12.25	8.00	12.25	18.00	12.75	9.00	13.25	21.50	13.75	9.00	14.75
发展型 消费	卫生费	116.50	26.25	10.00	50.92	10.75	6.50	4.60	7.28	18.00	12.00	4.50	11.50	26.50	11.50	4.70	14.23
	教育费	127.25	71.50	24.50	74.42	36.00	22.75	13.45	24.07	48.25	27.50	11.35	29.03	64.50	38.00	9.00	37.17
	器具费	48.25	21.75	10.50	26.83	14.75	12.50	6.25	11.17	18.00	12.00	6.25	12.08	28.50	17.50	9.25	18.42
	临时费	75.50	26.75	11.50	37.92	11.00	9.25	3.00	7.75	14.78	8.00	3.75	8.84	24.75	11.75	5.50	14.00
享受型 消费	娱乐费	83.25	19.25	8.75	37.08	13.50	7.00	3.33	7.94	14.00	7.50	3.67	8.39	23.75	13.00	4.67	13.81
	嗜好费	119.25	38.00	12.50	56.58	20.00	11.00	6.00	12.33	24.00	13.75	8.75	15.50	33.00	17.50	9.25	19.92

资料来源:山西省政府统计处编纂:《山西省第九次经济统计正集(民国十六年分)》,民国十九年刊行。

说明:士下的娱乐费在资料中为87.5,笔者按照均值计算应为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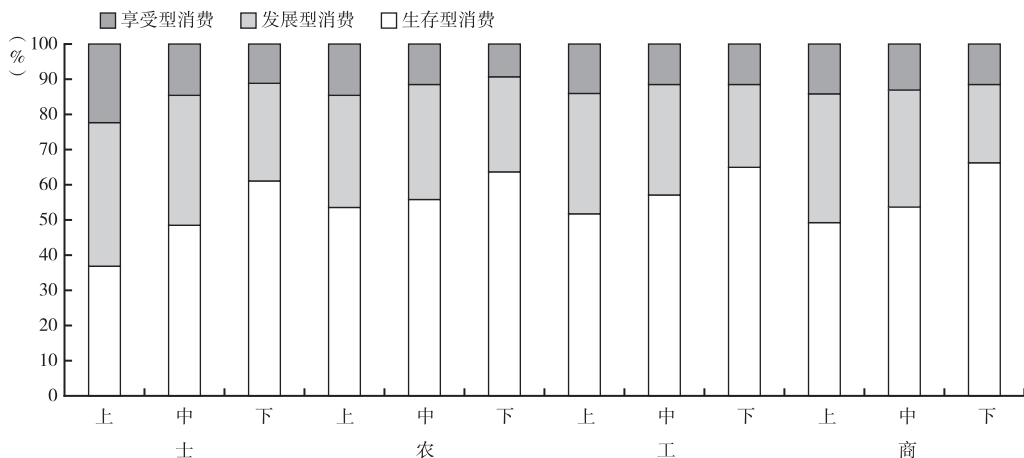


图 1 1927年太原在职人员消费结构图

资料来源:据“表3 1927年太原市民生活费”整理绘制。

具体而言,食品方面山西“较之各省,第宅虽壮,饮食极简,家资万金,三餐膳粥”,^①主要以面食为主,兼以米豆等。太原市“城西近汾水诸村,则产稻”,^②因此喜食米。作为收入最高的省会城市,太原市粮食价格在省内并不算高,如1923年太原市包括小米、大米、杂豆、茭子、白面等在内的粮食价格甚至低于省平均物价水平,1927年小米、大米、小麦价格虽高于省平均物价,但低于孝义、平遥、介休等地的物价。^③市内还有40家鲜菜业、50家肉业、21家干菜业、26家酱园业和29家糕点业,以及几家饼干业、糖果业、罐头业、牛奶业等,作为家庭主食之外的辅食或零食。另外外出聚餐也有不同档次可供选择,即有价格较为亲民的包子铺、馄饨店等家常小饭馆,也有规模较大的中餐厅如并州饭店、晋隆饭店、正大豫菜馆等,还有新式西餐厅如山西大饭店、证大方点、晋谷香等。

衣着方面“住民(中等之家),衣服多用棉布,不染浮华的恶习”。^④布匹中最便宜的为粗布,洋布较贵。另外还有省内自产的爱国布,刚出现时生产率较低,价格一度高于洋布,后价格逐渐降至洋布

①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一编第2页。

② 周宋康:《分省地志(山西省)》,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八年版,第三编第147页。

③ 山西省政府统计处编纂:《山西省第九次经济统计正集(民国十六年分)》。

④ 周宋康:《分省地志(山西省)》,第三编第77页。

以下。因此若求节省,则购买粗布制衣;若条件允许,则购买从天津运来的洋布;至于爱国布则由于价格高质量平而不如其他两种畅销。当时量体裁衣的工作除了交与家庭妇女亲力亲为外,还有服装店代为加工。随着近代流行趋势和文化的传入,衣着样式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流行起西装革履的装扮,新式衣服的专业裁缝剪裁推动了太原服装业的繁荣。到20世纪30年代,太原服装业呈现出激烈竞争的态势,为提高竞争力,原位于首义门的华泰厚成衣铺搬迁至地价昂贵的柳巷,并更名为华泰厚西服庄,聘请高级服装技工,由加工改为备料承做毛料、布料等男女服装。华泰厚与桥头街的义泰隆、柳巷的义和祥、南肖墙的同生祥成为太原服装行业的四大家。

居住方面,根据《晋绥社会经济调查统计年刊》统计记载,阳曲县39401户人家中33541户为有房户,约占85%。^①太原作为山西省府、华北重镇,商贾云集,“市民五方杂处,侨寓占十之八九”,^②因此旅店、客栈等十分普遍。住房价格按照地段的繁鄙,价格不同,分成九等,大体是从柳巷、钟楼街向周围直到城门处辐射递减,中心最贵的达到每月15元,最低的城门外则只需每月5角到7角(见表4)。在此之上,“至于房屋之新旧、装修之优劣,院子之大小往往随高下而有参差。但一般观察,殊不能出此无形之等级。”^③至于旅店房价,则根据提供服务优劣有别,最贵的一日1元5角至10元不等,如山西大饭店、正大饭店等,其余旅店则为8角、5角、4角、3角不等,如泰安栈、迎宾楼、迎宾旅馆等。对于长期居住在太原的人来说,若非原本家中有房的本地人,则住宿费也将是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开销。

除此之外,城市居民所用燃料不若农村居民可砍柴自给,因此有形成购买燃料费一项。山西作为煤炭资源大省,煤炭价格仅每百斤几百文,燃料费用相对较少,但对于农下、工下这些阶层,也是一项不小的开支。

表4 民国太原住宿等级价格表

等级	价格(大洋/月)	地段
第一等	十五元	柳巷、钟楼街、东羊市等处
第二等	十元	西羊市、鼓楼街、红市街、上肖墙等处
第三等	七八元	中和市场、估衣街、南市街、督军街等处
第四等	五六元	道门前、西肖墙、西华门、首义街、正大街等处
第五等	二元	东西辑虎营、府西街、棉花巷、三桥街、精英街、新成街、侯家巷等处
第六等	一元	早西门街、成方街、大小北门街等处,
第七等	八九角	大小铁匠巷、云路街等处
第八等	六七角	新南门外之满洲坟、北门外之兵工路上关等处
第九等	五六角	东西门外等处

资料来源: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22页。

(二)发展型消费

民国太原市只有士上阶层是以发展型消费为主,其他阶层发展型消费仍然不占主体地位。发展型消费中占最大比重的是教育费用,基本上占到了10%—20%之间,是除食料费和服装费外的第三大项支出。民国山西将教育作为公共事业来发展,以财政支持教育,以提高人民接受教育的热情,因此“人民对教育都很信仰,作父兄的都愿意叫子女读书”,^④可见当时太原市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为提高国民普遍素质,实现教育平等化,山西从1917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强制适龄儿童接受教育,使文盲比率大大降低。学校遍布全市各个街巷,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专科、大学,横跨士农工商学

① 晋绥社会经济调查统计社编印:《晋绥社会经济调查统计社年刊》,1935年印刷,第41页。

②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一编第22页。

③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一编第23页。

④ 王卓然:《中国教育一瞥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二年版,第36页。

各个领域。教育理念因材施教,讲求实际,“中学校学生入学之初,询以是否升学,如尚须升学则令遵照部章授课,否则即令减少西文钟点,而授农工商实习之课。”^①当时教育覆盖面虽广,但教育质量一度受到考察者们的怀疑。由于义务教育人数众多,因此各学校分配的经费也有限,校舍较为简陋,如外国文言学校,“房舍和里面的布置都简陋异常——如英法班的讲堂、自习室和饭厅都在一处”。^②

卫生费主要是当时的医疗费用,除士上阶层卫生费较高,为116.50元外,其他阶层卫生费用都比较少,最高的也仅为26.50元。可见当时医疗价格较高,未能普及。太原市政府当时并没有单独的卫生机构,只在疫情十分严重的时候成立临时机构,采取应急措施。医院多为私人医院和教会医院,是盈利性商业服务而非社会保障,其高额费用使囊中羞涩的人家望而却步。

器具费所占比例较少,且不同阶层人员所花费器具费差距较小。当时日常所用器具多数仍为作坊工业出产的手工业制品。这些手工作坊所做之物基本涵盖了生活所需的家具、器材、洗护、家纺等等,由于全系手工制造且历史悠久,因此其价格水平不相上下。

(三)享受型消费

享受型消费是最高级别的消费,生活水平越富有则此项消费在总消费中占比越大。在太原人民消费结构中主要是嗜好费及娱乐费。嗜好一般具有较强的持续性,较难改变,因此在生活费中所占比例较高,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仅次于教育费的第四大消费项目,且各阶层的嗜好费比例差异较小。吸食烟土即为其中一项重要嗜好,早在清末《退想斋日记》中就有记载“约略记之,吸之者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二三”,^③可见烟土吸食者范围之广。民国后开展禁烟运动,实则禁私卖而不禁吸食,代之以官方制造的“戒烟药饼”,每块重五六钱,价值两元上下,“从此各地烟民争相购买,公开吸食烟土”。^④

娱乐费是生活无忧之后的高级消费,因而档次不同且费用相差较大。民国太原的书场有柳巷书场、开化市书场等,也有沿街说唱,一般2个铜元一场。也有带书场和戏院的茶馆,需另付茶资。戏曲不甚发达,仅有承庆园、鸣盛楼和新化茶园三处,票价约在1角至5角之间,包厢则需要2到5元左右。电影除了山西大戏院、中华大戏院、新南门内青年会礼堂、平安电影院等有播放外,还成立了华北唯一的电影公司——西北影业公司,但由于影片质量不高,不甚受欢迎。^⑤另有太原最早的曲艺厅——太原屋顶花园曲艺厅,兼营曲艺和电影,“场内摆设藤椅、藤桌和各种花草、干鲜果品、茶水冷饮应有尽有……票价较贵,平民百姓是不去的。”^⑥

四、市民贫富差距

在分析了太原居民的生活消费结构以后,尚需进一步分析其贫富差距。对太原城市在职人员生活总消费进行考察,表5可见1923到1927年太原各阶层在职人员生活费从最高的士上到最低的农下差距在800元左右,生活差距之大可见一斑。四种职业中士的生活费最高,平均达到450元以上,与居于其次平均生活费在200元以上的商人差距有200多元,工人和农民较为相近,生活费都在200元以内。除此以外,各阶层内部也存在生活费差距,特别是士的上中下三个阶层生活费差距也较大。

① 陈希周:《山西调查记》(上),第4页。

② 冯沅君:《晋省学校漫记》,苏华、何远编:《民国山西读本(考察记)》,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原标题为《晋鄂苏越旅行记》,载于《晨报副刊》1922年8月9日至17日。

③ [清]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④ 杨彬:《阎锡山的“禁烟政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太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太原文史资料》第11辑,1988年印刷,第30页。

⑤ 崔汉光:《太原西北电影公司简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太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太原文史资料》第10辑,1988年印刷,第108页。

⑥ 贾立进主编:《民国太原》,第37页。

表 5

1923—1927 年太原市人民生活总消费

单位:元

阶层	士				农				工				商			
	上	中	下	均	上	中	下	均	上	中	下	均	上	中	下	均
1923	848.25	360.25	157.00	455.17	184.00	118.25	56.00	119.42	244.75	147.75	75.95	156.15	357.50	203.00	83.50	214.67
1924	869.19	343.18	188.99	467.12	204.00	142.28	96.65	147.64	253.91	175.16	113.10	180.72	334.56	219.73	135.31	229.87
1926	896.00	376.75	199.33	490.70	223.00	165.50	86.23	158.24	277.25	171.5	94.78	181.18	387.25	221.00	120.65	242.97
1927	902.75	396.25	197.40	498.80	227.75	157.50	101.13	162.13	282.75	187.00	108.52	192.76	396.75	235.50	125.70	252.65

资料来源:各年总消费项分别来自山西省长公署统计处编纂:《山西省第五次经济统计正集(民国十二年分)》,民国十四年刊行;晋绥总司令部统计处编纂:《山西省第六次经济统计正集(民国十三年分)》,民国十七年刊行;山西省政府统计处编纂:《山西省第八次经济统计正集(民国十五年分)》,民国十九年刊行;山西省政府统计处编纂:《山西省第九次经济统计正集(民国十六年分)》,民国十九年刊行。

说明:1924年士上的生活费在资料中为 569.19,笔者按照均值计算更正为 869.19;1924年士的生活费平均值在资料中为 367.12,笔者更正为 467.12。

为了更加准确直观地考察当时人民生活差距,我们使用基尼系数来计算生活费差异系数(Difference Coefficient of Alimony)。由于史料阙如,我们没有找到当时太原不同阶层收入的详细资料,因此将基尼系数中的收入指标用消费指标替代,计算结果即为生活费差异系数。生活费差异系数可以反映居民生活费的差异情况,进而反映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从侧面影射收入分配差距。根据生活费由少到多将各阶层人口和生活费进行分组排序,其中总消费数据来自表 5 中各年生活费,人口数据来自山西省第六次、第七次、第九次人口统计。^① 根据公式 1 计算 1923、1924、1926 年生活费差异系数并绘制洛伦兹曲线,如图 4。

$$DCA = 1 - \left(\sum_{i=1}^n (Y_i + Y_{i+1}) * \frac{X_i}{2} \right) / \left(\frac{1}{2} \right) \quad (1)$$

公式 1 中 DCA 为生活费差异系数, Y_i 为第 1 组到第 i 组人口累计消费占全部人口总消费的比重 (i 等于 1 时, Y_i 等于 0), 即图中第 i 个计算点的纵坐标, X_i 是第 i 组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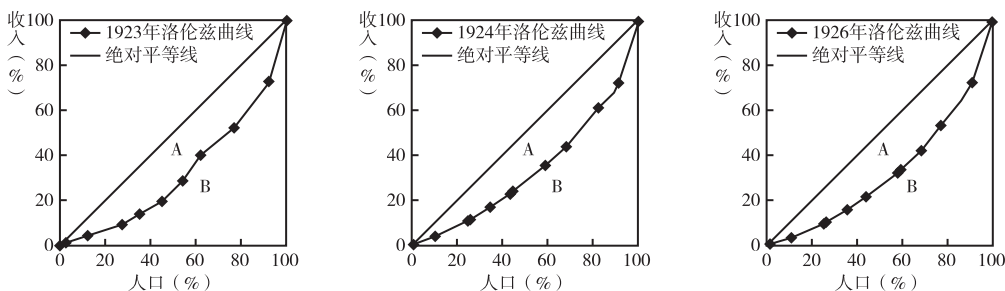


图 2 民国太原市在职人员生活费的洛伦兹曲线

图 2 中可以看出,整体来看,生活费的洛伦兹曲线与绝对平等线间的面积 A 和绝对平等线以下的面积 (A + B) 之比 $S_A / (S_A + S_B)$ 即为生活费差异系数 DCA, DCA 是 0—1 之间的系数,洛伦兹曲线弧度越大则生活费差异系数 DCA 越接近于 1,生活费差距越大,生活水平越不平等。根据公式 1 计算得出 1923、1924、1926 年在职工人员生活费差异系数 DCA 分别为 0.36、0.325 和 0.351,根据基尼系数的指标,通常把 0.4 作为收入分配差距“警戒线”,^②则民国时期太原市民的生活费差异已经接近警戒线。

收入水平是消费水平的直接影响因素,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消费差异系数为 0.36 所对

^① 山西省长公署统计处编纂:《山西省第六次人口统计(民国十二年分)》,民国十四年刊行;晋绥总司令部统计处编纂:《山西省第七次人口统计(民国十三年分)》,民国十六年刊行;山西省政府统计处:《山西省第九次人口统计(民国十五年分)》,民国二十年刊行。

^② 胡祖光:《基尼系数理论最佳值及其简易计算公式研究》,《经济研究》2004 年第 9 期。

应的收入差距应该在0.36之上,即民国太原在职人员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或超过“警戒线”。再加实际情况中必然存在一定数量的无业人员,他们或为外地在省会上学的学生,其生活水平取决于其家庭收入;或暂时性失业,其生活水平取决于以往的积蓄;或为鳏寡孤独者,其生活水平倚靠政府及邻里朋友的救济。如果将这些无业人员的生活费考虑在内,则生活费差异系数还会增大。1929年的《山西日报》就有文章,评论了当时失业挨饥受饿的贫民、乞丐、流氓和足冻手冷的洋车夫、泥水匠、清道夫等,可以说触目皆是,称其为太原市的美中不足。^①另外,关于太原电影界的描述中也有“戏院除一些商贾、市民及机关职员、太太们光顾外,很少有学生涉足”,^②可见当时电影等一些享受型消费是学生等无业人员无法企及的,他们与商贾、机关职员的生活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有学者认为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的两极分化极为明显,少数官僚垄断资本家统治阶层日益富有,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贫困状态。^③

五、传统城市近代化对生活水平的影响

整体而言,民国时期太原城市近代化取得了较大进步,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人口职业结构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近代工业、商业方面都有了较大发展,城市建设方面也有所进步。这种变化一方面为居民生活注入了新的内容,另一方面却又受到发展的需要限制。

居民生活内容有了新的变化,食品方面虽仍崇尚简朴,但也开始注重健康营养,正如牛奶广告中所说“健纯牛乳是浓甜可口,谋健康的救星,防疫痿的要素”,^④并且有冰激凌、汽水等零食售卖。衣着方面也开始追求西装等新式的服装样式,并且由于纺织业的发展,本地生产爱国布也可供选择。娱乐方面除了有西餐饭店、电影院、茶馆之外,还有新建的中山公园、文瀛公园等,公园内设有篮球、网球、国术、滑冰等场地,还有民众茶社和冰激凌馆等休憩场所,^⑤文艺娱乐和体育健身等并举。最重要的是教育理念的变化,山西晋商兴盛,多重商轻文,民国以后特别是义务教育施行以后,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教育消费成为在职人员一项重要消费,教育公共化、平等化、普及化程度增强,并且在教育内容上注重近代科学和职业技能并重,以实用为目的培养人才。

然而,近代化优先发展工业的需要,对市民生活的影响有所折扣,市民仍以满足生存需求为主要目的,其生活水平并未脱离生存压力,并且贫富差距较大。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虽然有利于工业体系的完善,但对人民生活影响较小。而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发展较为薄弱,虽然有爱国布、卷烟等本地生产的新式国货,但由于不能保证质优价廉,无法与外货竞争。加之外货倾销,传统手工业也渐入没落,李希霍芬就曾举山西制针业衰落为例,认为“这就是廉价优良外国品输入的结果……这不仅是北方衰退的相对的原因,乃是绝对的原因”。^⑥其次,为积累工业资本开源节流。在财政方面增加农业税收,而对工业税收特别是公营工业税收则多有优惠减免。资本通过再分配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不仅以公营事业的方式增加工业投入,还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筹集资金。在生产经营方面则极力俭省,在工厂建设和生产过程中,能省即省。工厂的房屋,十分简陋,工人工资则尽力减至太原的最低生活水平程度。如《民国日报》报道,位于城隍庙街的平民工厂“内容极其黑暗。窗户紧闭,恶臭刺鼻,工人排列两行,面色黄瘦衣服破烂,且具惊恐的气象。其制袜纺织等厂工人尤苦于制鞋厂,菜园工人完全裸体,脸上污秽,形如鬼怪,厂内一概费用外还有余积,菜园既是厂内余积所

① 贾立进主编:《民国太原》,第446页。

② 张衡夫:《30年代西北影业公司及电影界概况》,《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印:《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8卷第95辑,1999年印刷,第1105页。

③ 许一友、王振华著:《太原经济百年史(1892—1992)》,第25页。

④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广告页。

⑤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150页。

⑥ 转引自周宋康《分省地志(山西省)》,第111页。

买的。”^①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溢出效应较大的长途运输和教育事业投入较大,而对医疗卫生和生活设施的建设则重视较少,财政对收入的再分配偏向工业和对工业有促进作用的行业,而对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则较为疏忽。

正因如此,资本快速并大量从多数人手中流向少数人和少数行业中,闲散资金集中为大规模资本。这种情况一方面迫使小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特别是农业人口和土地的分离,汇聚生产资料并产生自由劳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公债、税收等方式进行货币资本的集聚,并由政府通过再分配投入到工业发展中。最终使收入涌向少数资本拥有者,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进而使代表生活水平的消费差距扩大,显示为生活费差异系数较高,贫富差距较大。这一阶段的贫富差距,不仅表现在奢侈性消费和娱乐方面,也波及基础性消费,医疗、水电、市内交通等基础服务收费高昂,仅供应少数官商富人,而普通民众则望尘莫及。少数官僚垄断资本家统治阶层日益富有,而广大劳动人民则处于贫困状态,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两极分化极为明显。^②

由此可见,作为传统城市向近代过渡的典型代表,太原在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虽有所改善革新,但由于近代化发展工业的动机抵消了一部分人民从经济发展中的获益,减缓了生活水平提高的步伐。同时,资本的有限性和近代化建设对资本大量需求的矛盾,也使产业发展和个人收入具有较强的偏向性,使近代化初期的城市发展呈现出一种非均衡发展的状态,行业和资本垄断日盛。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其本身极易引起社会动荡,更由于在基础性消费中存在的差距,促生了为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贪污腐败等不正当敛财手段,也为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

Study on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Citize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aiyuan City

Li Huan

Abstract: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cities in modern China were less affected by the west, and reta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natural development. Taking Taiyuan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traditional c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analyzed the living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Taiyua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Taiyua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been fruitful and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way of life of the citizens. But this effect was limited by the need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as widen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yuan; Modernization; Living Standard

(责任编辑:王小嘉)

^① 《山西平民工厂之黑暗》,贾立进主编:《民国太原》,第409页,原载于《民国日报》(上海版)1922年9月10日。

^② 许一友、王振华著:《太原经济百年史(1892—1992)》,第25页。